·本土化与中国学术转型·

DOI:10.20004/j.cnki.ujn.2025.06.008

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及其文化底蕴

庞　敏

(山东大学 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山东 青岛 266237)

[摘　要]在资本主义现代化对外扩张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创造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不同于欧美现代文明,并且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在于它植根于中华文化"和合共生"的丰厚沃土,迥异于欧美社会崇尚对抗的竞争文化,更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能够推动历史悠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全新的人类文明理念。在中华文明与欧美文明之间的基本性质比较中,能够更为清晰地揭示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与中华民族的精神智慧相互贯通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和思想高峰,指引中华文明在"两个结合"中重焕荣光。

[关键词]文明新形态;文化范式;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25)06-0066-08

当前,世界文明格局经历深刻调整,全球化进程与文化多样性正深刻改变人类文明面貌。在这一大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①可以说这一理论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从国内学界的已有研究成果来看,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维度,探寻人类文明新形态创造的根本遵循、基本原则和具体路径成为有关研究的主要取向,这为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动中华文明现代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但综合来看,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在当前世界文明形态的深刻变动下,如何揭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本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框架内理解"第二个结合"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对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更为鲜明地阐释文明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与中华文化传统的内在逻辑,也关系到我们应如何在全球文化格局变动中寻找自身的文化道路与发展路径。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以来国外学界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研究"(项目编号:YJC710070);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党建赋能非公企业发展的机制研究:理论与实践"(项目编号:ZR2024QG170)。

[作者简介]庞敏,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海外中共学中心研究员,邮箱:mpang@sdu.edu.cn。

①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一、“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文明形态超越

西方学者所论及的现代文明，往往特指“欧美文明”或“资本主义文明”，因为这种现代文明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框架内得以清晰界定的，“‘现代文明’之被定义的内容与实质，它获得理解的基础与根据，以及被用来进行推理和想象的标准和法则，无一不将这一文明揭示为西方文明、欧洲文明，更确切些说，资本主义文明”①。究其实质在于，西方资本主义开启的现代文明成为一种“普照的光”，这迄今仍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可以说，“世界历史作为事实存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原初形态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标志着人类历史真正成为世界历史”②，而这鲜明地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资产阶级创造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充足的物质财富，丰裕社会成为现代文明的典型特征；其二，资本主义大工业开辟了世界市场，打破了以往那种民族、地区或者国家之间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③。资本主义文明有着更为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资产阶级永不停歇地奔走于全球各地“安家落户”，它质优价廉的商品流通于世界的角角落落，创造了一系列超大的城市、密集的人口、集聚的生产资料以及巨额的社会财富等组合而成的“区域联合体”。由此以来，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设出一个遍及全球的现代文明形态，为未来建立自由劳动者联合体奠定了历史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现代文明“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④，进而言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先行探索”，为“后发地区”开展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明图景”。

然而，西方现代文明并没有如资产阶级学者们所预期的那样“终结历史”，反而成为“即将逝去”的落后文明形态，这种趋势并不是“外力推动”的现代性后果，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结构所导致的现代性后果。与不能适应当时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封建所有制关系类似，当代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已经无法容纳越来越开放的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导致“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⑤。周期性爆发的商业灾难和金融危机反复证明：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狭隘范围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全面升级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办法不过是饮鸩止渴，永不停歇地“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

考察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进程即可知，“资本积累对生产资料的侵占和掠夺、对劳动力的支配及压榨，是以‘血和火’的记忆载入资本主义发展史的”⑥。随着资本主义扩张而来的不是世界和平与合作共赢，而是持续不断的地区动荡和贫富分化。特别是20世纪以来，两次规模浩大的全球战争彻底警醒世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的论断，已经沦为彻彻底底的谎言，资本主义制度就是国际灾难性战争的根源。韦伯等学者曾前瞻性地指出，倘若“不立即把这种牟利的斗争为着公共的利益而控制起来，并且本着牟利以外的其它动机，逐渐地以一些较好的工业组织来代替牟利

①吴晓明：《当代中国的精神建设及其思想资源》，《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

②苏昕，常江：《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历史意涵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叙事》，《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4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6页。

⑥颜景高：《论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三重批判》，《江汉论坛》，2024年第12期。

的资本主义组织,则文明本身是否注定被资本主义的统治所毁灭,实在未可预料"[①]。如此一来,以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新文明形态,即建构共赴人类美好生活的自由人联合体,就在资本主义文明坍塌的趋势中昭示而出,而中国式现代化则在"合理扬弃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将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有利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成果纳入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总体实践框架,赋予人类文明形态新的内涵、形式和价值"[②]。

近代历史上,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赓续千年的中华文明被以'先进'著称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速度和广度冲击"[③]。对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而言,"学习西方"的现代化进程总是遭遇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的肆意打断,"老师欺负学生"的霸权行径成为资本主义文明秩序下的常态。中国仁人志士学习西方屡遭失败,他们开始探寻超越资产阶级共和国且更为文明的现代化建设方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提供了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的光明前景,"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这次革命由于发生在情况和中国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相近(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而对中国人民具有特殊的吸引力"[④]。特别是在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试图瓜分中国的特殊时期,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1919年7月主动发布对华宣言,表示"废弃(沙俄在中国境内享有的)一切特权",这让饱受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积极"研究俄国劳动政府的主义""俄国劳农政府所根据的真理"[⑤]。自此以后,先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历经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为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踏上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和改革开放新征程,并且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任务。历经"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造就了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现代化孕育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雏形,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重工业"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自己的创造性很少。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⑥]。从历史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我国渡过了现代化建设最为艰难的时期,成功奠定了现代化建设的工业基础。从以苏为鉴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逐步突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困惑,科学地把握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⑦]。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创造中国式现代化进而决定当代中国的命运,正在于它为我国突破资本主义制度的束缚提供了重要契机。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式确立和顺利发展,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成就。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根本突破,中国由此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并且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持续推进改革开放,始终

①锡德尼·维伯,比阿特里斯·维伯著;秋水译:《资本主义文明的衰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8页。

②龙钥儿:《文明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意蕴探析——兼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形态意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25年第9期。

③张杰克:《大历史观视域下"第二个结合"出场逻辑的三维透视》,《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

④《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第23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立场和原则，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作为我们党的奋斗目标和重大责任。一方面，在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广大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配套措施，因地制宜“开药方”“拔穷根”“夯基础”，“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帮扶转变，让发展成为消除贫困最有效的办法、创造幸福生活最稳定的途径”①。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主动顺应全球化发展趋势，积极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多丽丝·奈斯比特等学者就认为：“中国勇于承担全球责任，但不是用武器，而是用投资和发展来履行这项责任。如果人们经济上能有所依持，就会对未来充满希望，和平就会成为众望所归的主题”③。中国致力于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助力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要，造福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生活，进而创造性地开启一种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和合共生”对“零和竞争”的文化范式超越

现代西方文明秩序的全球建构，奠基于资本扩张的历史进程之中，同时植根于欧美社会的文化沃土。马克斯·韦伯之所以考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勾连，就在于揭示历史悠久的基督教传统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西方文化，“我们唯一希望的是确定对于那种精神在世界上实质形成及大规模扩张过程中，宗教力量是否起了作用，起了多大作用。进而言之，我们要确定资本主义文化的哪些具体的方面可溯源于宗教力量”④。对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而言，个人主义是根深蒂固且最为显著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个人主义性质的西方文化支撑着资本主义演进、塑造着现代文明秩序，且迄今依然保障着多元文化之间的互动及其增长。丹尼尔·沙拉汉指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全球性互相依存局面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欧以及后来美国个人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所塑造的网络的产物”⑤。在考察个人主义与西方宗教改革之间的关系时沙拉汉发现，个人主义奠基于基督时代的宗教神学和宇宙论框架之内，由此引发了占有性资本主义话语，换言之，资本主义扩张精神与基督教意义上的自我伸张是同构的，“当加尔文的逻辑脱去宗教的装饰，内在授权的自我便开始就个人获得和占有的能力来检验和扩张它的力量”⑥。简言之，从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传统来说，个人主义自身就是这种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西方人的价值信仰，在这个全新的信仰体系中，个体不仅是一种独一无二的价值存在，而且成为真理正确与否的终极裁断者。

十字军运动是欧洲文明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集中彰显了基督教文明对外扩张和征服的文化基因。正如基佐所指认的：“精神原因是你们所知道的宗教感情和信仰的冲动。自7世纪以来，基督教一直与伊斯兰教斗争。在严重的威胁之下，基督教在欧洲获得胜利，把回教遏制在西班牙，并在以后一直致力于把他们逐出境外”⑦。作为全欧事件的十字军运动，同时成为各个欧洲国家内部的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40页。

②《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5页。

③多丽丝·奈斯比特，约翰·奈斯比特，龙安志著；张岩译：《世界新趋势“一带一路”重塑全球化新格局》，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205页。

④马克斯·韦伯著；彭强，黄晓京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9-70页。

⑤丹尼尔·沙拉汉著，应奇译：《个人主义的谱系》，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185页。

⑥丹尼尔·沙拉汉著，应奇译：《个人主义的谱系》，第106页。

⑦基佐著，程洪奎等译：《欧洲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5页。

全国性行为,国王、贵族、教士、市民、农民以同一种思想和同一种感受为这一“扩张和征服”行动舍生忘死,这种咄咄逼人的个人主义,以及浮士德式的扩张精神,集中彰显了基督教与欧洲文明“传播福音”“教化世界”的自我意识,这一使命被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天命观”所完美阐释,并在“击败敌人”“征服他者”的宗教式号召中完成了政治团结、民族融合的作用。时至今日,文明冲突论仍被欧美人奉为圭臬,哪怕他们已经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①],事实上,处于衰落周期中的西方文明依然秉持零和博弈的惯性思维,试图用大国霸权来应对各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均势变化。

而西方国家就是以“霸权崛起”的维度来看待中国发展的,依照西方文明和文化发展零和博弈的思维范式,所有大国在经历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的同时或在紧跟其后的某个时刻,都会不由自主地开始自我伸张并对外扩张,英国、法国、德国,还是日本、美国和苏联,都无一例外地实行了帝国主义战略,因而过去几个世纪曾经遭受屈辱并且在21世纪保持高速工业化的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必定“威胁世界”,因为“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恰恰给出了与之相反的答案,中华文化中的“和合共生”思想,强调的是“和而不同”,即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在对立中追求合作。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共生理念为现代世界文明提供了新的视角,即通过包容和融合实现多元文明的和谐共处。与西方的竞争文化不同,中国文化更注重差异的尊重和共生的可能性,从而避免了“零和竞争”带来的紧张与对抗。

中国的文化理念也直接影响了制度的设计和实践。从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在保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动市场活力和国家资源,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一制度创新,突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市场独占,体现了“和合共生”的制度智慧。从现实来看,中国的这种制度优势,也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示范,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等国际合作项目中,展现了制度上的包容性与合作精神,暗含了“和合共生”的文化底蕴。

而制度不仅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更是文明形态的体现,早在西汉时期,中国就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沿线各国的经贸发展,并且成为东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友谊之路”,中国明朝时期的“郑和下西洋”,这支堪称“大航海时代”先驱的庞大舰队,不仅没有引发“以大欺小”“倚强凌弱”的冲突行为,反而建立了“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体系。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也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治实体,而是一个“从古延续至今的唯一文明”,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源自中国人“内敛谦和”的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以礼相待、以德服人、以文化人的民族禀赋,早已积淀为古老中国生生不息、蓬勃发展的精神源泉。中国先人早就明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中国人的血脉中根本就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文化基因,正如罗素所说:“如果说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骄傲到不屑打仗’,那这个国家非中国莫属。中国人天然有这样一种态度——宽容、友善、恭敬有礼,希望别人也报之以礼”[③]。而西方国家错误地将当代中国纳入文明冲突的对抗逻辑,不过是基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列强争霸的历史考量,并且这种谬误根源于西方“征服和扩张”的文明进程和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④]。中华民族的和平主义传统历久弥新,中国人民对人

①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288页。

②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05页。

③伯特兰·罗素著,田瑞雪译:《中国问题》,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第219页。

④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

类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或者说，当代中国就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历经多年战乱磨难的中华民族，在实现国家独立之后不久，就确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传承中华民族和平主义的文化传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①]由此观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也有突出的连续性，中华文明现代发展赓续着古老文明“以和为贵”的优良传统，并且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合共生”的丰厚沃土之中。

由此，从文明比较的意义而言，中国人崇尚中庸之德、和谐之美，根本无法认同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明冲突和对抗逻辑，因为就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而言，中华民族有着相当久远的和平主义历史传统以及共享发展的文化基因。从文化到制度，再到全球文明的引领，“和合共生”理念的逐步转化与实践，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而“和合共生”的文化理念不仅引领中国国内发展取得历史性进步，更在时代变局大背景下推动了全球合作与发展。这标志着中国历史文明从传统文化发展为现代制度进而走向全球治理，这一过程推动了国际秩序的重构和文明格局的转型，最终实现了“和合共生”对“零和竞争”的文化范式超越。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绝不是搞“颜色革命”那一套，也不是鼓吹“文明冲突”的零和博弈，而是推动“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②]。

人类文明新形态不是形成“消灭古老文明”的一种新文明形态，它具有突出的连续性，是文明传承更新的结果。中国先人有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创新意识，中华民族始终保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中国共产党深化改革开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这一鲜明的文化主体性“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③]。共产主义理想植根于天下为公的文化沃土，社会主义信念与天下大同的古老观念相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传统中国”的质的飞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在人类文明转型这一决定性的历史拐点开启的，它需要全新的文明理念和深厚的文化资源的有力支援”[④]。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和发展程度不尽相同，但这种差异不是文化交流的障碍，更不是文明对抗的理由，“不同文明、制度、道路的多样性及交流互鉴可以为人类社会进步提供强大动力”[⑤]，推动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成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不竭源泉。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我们有着共同的关切，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所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每一个民族的共同心愿。概言之，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又有突出的包容性，中华民族从“传统”走向“现代”，意味着历史悠久的古老文明实现了“凤凰涅槃”式的重生，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为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中华文明在融合发展中重焕荣光

基督教新伦理将赚钱行业看作一种高尚职业，西方文明对工商业扩张寄予厚望，源自那个时代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权力中枢”和“幕后集团”对人性观念的“革命性”改造，艾伯特·奥·赫希

①《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第34页。

②《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396页。

③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④何中华：《文明的历史含义及其当代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6期。

⑤习近平：《同舟共济创造美好未来——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8日第2版。

曼考察前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性观念发展史之后认为:“对金钱的贪得无厌,常常被认为是贪婪这种欲望最具危险性的、最应受谴责的一面。由于不可思议的扭曲,由于后来霍布斯式关于人类非确定性思想的先入之见,现在贪得无厌成为一种美德,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持久性。”[①]换言之,推动17-18世纪西方世界大肆扩张的文化动因,在伦理道德层面上得到了阐释和确认,从黑格尔“理性的狡计”,到弗洛伊德“升华的概念”,再到斯密“看不见的手”,“人性的恶”“被压抑的欲望”“自利的行动”都被转化为推动现代社会转型的建设性力量,这意味着“在受利益驱动的行为被视为主导行为的情况下,欲望无须被考虑在内”[②]。如此一来,“自利的人”成为社会机构调节共同行为的基本准则,冲突和对抗成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价值共识,更确切地说,扩张领土的野心、殖民扩张的欲望以及争强斗狠的秉性,诞生于残存的、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并且被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竞争文化和扩张意志所有力推进。

但对于崇尚集体伦理的中华民族而言,“尽管历代有不同的义利观,但彼此却有重要的共同点,即各家的相通与兼容。强调维护百姓的利益、以民为本”[③]。“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已经内化为中国人的道德自律,并且成为中国先人考虑义利问题的出发点,业已创新性地转化为中国共产党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这种以集体价值为导向的社会制度中,和谐文化和合作精神有着更为深远的广泛影响,互利共赢的理想和信念日益融入经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人们更加倾向于用协作的组织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的竞争结构,“不管这些社会主义者采取何种策略,就其本质而言,他们都坚持认为人类能够且必须从根本上以互惠合作的方式相互协作”[④]。实际上,不同社会制度都存在人类对抗和文明冲突的迹象,同时也拥有和谐相处与合作共赢的潜力,何种“可能性”被唤醒并充分发掘,在很大程度上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正如人类文明发展史所揭示,西方式的对抗性文化导致霸权主义全球秩序,而中国式的融合性文化塑造出合作共赢的发展前景。从文明发展史上看,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鉴往往能够诞生更优异的文明形态,比如,希腊积极学习埃及、叙利亚以及印度等不同文化形态中的优秀成分,不仅没有迷失在不同的文化元素里,并且在融合这些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推动希腊文化进入鼎盛时期,进而创造了灿烂的希腊文明。换言之,唯有历经古今中西文化熔铸汇通,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才能获得繁荣发展的历史契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根源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从历史上的佛教东传、‘伊儒会通’,到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华文明始终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⑤]。从自然维度上的“阴阳和合”,到社会维度上的“中和之道”,再到价值维度上的“和谐之美”,历经长久的“文化结合层面上的锻炼”,“和合”已经内化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国民性格。正是基于中华文化的“和谐之美”“和合之道”,中华文明彰显出突出的包容性,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刻批判性借鉴西方文明、继而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罗素曾前瞻性地指出:“中国需要一种新元素激活本土传统,应向西方文明寻找滋养。但他们不愿意构建和西方一模一样的文明。正是这种愿望里蕴含着最好的希望。如果中

①艾伯特·奥·赫希曼著;李新华,朱进东译:《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50-51页。

②艾伯特·奥·赫希曼著;李新华,朱进东译:《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第125页。

③郑师渠:《中华民族精神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74页。

④迈克尔·克尔伯格著;成群,雷雨田译:《超越竞争文化——在相互依存的时代从针锋相对到互利共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⑤《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国人没有受到唆使而变成崇武好战一族，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一种完全崭新的文明，比西方人一直努力创造的所有文明类型都要好”[①]。作为西方文明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能够激活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文化基因，为更好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基本遵循。

中华文明现代化发展具有突出的“中国属性”，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民族特性，同时更为清晰地彰显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这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并且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基本定向的。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重塑，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立理解与创造性转化。这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话语框架，也为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主义话语争取了更广泛的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第二个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范畴再造，完成了理论与概念的创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式现代化”等新的理论命题和概念的提出，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更通过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新时代中国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路径，也为全球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的历史进程正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过程”，这就要求我们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丰厚沃土，推动中华文明实现蜕变式的现代转化，进而塑造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新时代的新文化使命，就是要立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目标，推动马克思主义扎根于更为广泛、更为深厚中国文化传统中，让马克思主义更好地“接地气”“说中文”，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人民之问”，着力推动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

可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不同于欧美现代文明，并且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既在于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特色，又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守共产主义信念，致力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中不断推进“第二个结合”。坚守好马克思主义之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意味着要“有效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贯通起来，聚变为新的理论优势，不断攀登新的思想高峰”[②]。作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我国成功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了中华民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正在意气风发地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博采众长的全球视野，形成了回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中国答案”，引领着未来文明发展的方向。

四、结语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源自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有机融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实践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凝练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种全新的文明形态奠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历史实践之中，更为全球文明的现代化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杨　旻]

①伯特兰·罗素著，田瑞雪译：《中国问题》，第237页。

②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二十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第488页。